

## 第七章

---

戈巴契夫的出身與特質



一九八五年三月，當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去世時，戈巴契夫未遭遇重大阻難，輕易地登上蘇聯政治結構的權力顛峰。他當時祇有五十四歲，是史達林以來最年輕的領袖。戈巴契夫是蘇聯共產黨新一代的領袖人物，他們沒有經歷過史達林統治下的折磨與恐懼，他們是共黨制度的產物，他們並沒有參與這個制度的創立。

因此，戈巴契夫繼任蘇共領袖，不是單純的權力轉移，而標誌著政治人物的換代。他不同於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這些人在史達林時代已爬上權力的上層。戈巴契夫這一代政治人物都在赫魯雪夫統治時代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

在蘇維埃式的政治結構中，一個政治領袖不僅會影響其政策的取向，而且也會影響到政治結構的本身。史達林曾經使蘇聯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等體制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形成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並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成立的共黨國家模仿。戈巴契夫的出現，將使蘇聯社會朝向另一個不同的方向改變。因此，要了解蘇聯今天的「改造」(Perestroika)，有必要先了解戈巴契夫出身家庭背景及其領導特質。

## 一、出身農家

米哈衣爾·賽爾蓋維契·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evich Gorbachëv，最後一個字的正確發音該是「戈爾巴喬夫」)生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他的父母皆是農民，居住在蘇聯南部、

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羅泊爾邊區(Stavropol)、克拉斯諾格瓦爾德斯克區(Krasnogvardeisk)內的普瑞伏爾諾耶村(Privolynoye)。這是蘇聯最富庶的產糧區之一。

他的父親，賽爾蓋·安德里耶維契(Sergei Andreevich)原是當地拖拉機站的一名機械作業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中服役，賽爾蓋是共產黨員，但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得並不積極，不願與人爭辯。戰後，回到拖拉機站工作，他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因此，在這個拖拉機站前後達半個世紀。

戈巴契夫的母親，瑪麗亞·潘黛莉芙娜(Maria Panteleyvna)，現齡七十八歲，仍舊居住在普瑞伏爾諾耶村。戈巴契夫有一個哥哥，在二次大戰中陣亡，另有一個弟弟，名叫亞歷山大(Alexander)，為陸軍軍官。據戈巴契夫的鄰居們說，米哈衣爾·戈巴契夫的性格像媽媽，亞歷山大·戈巴契夫像爸爸。但是，米哈衣爾本人說，在情緒上他受母親的影響較多，在智力上受父親影響較深。

戈巴契夫曾對訪問他的記者說：「雖然父親是個樸實的人，但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他的母親是他們家庭內的火花塞。瑪麗亞在村內會議上，總是第一個發言。據地方官員說，她是一個固執、頗有主見的婦女；治家甚嚴。戈家的家規由她一手制訂。

幼年時，米哈衣爾同祖母很親近。她是一個虔誠的俄羅斯東方正教教徒，因此戈巴契夫在她的帶領下受了洗禮。在無神論運動的高峰時期，她不顧危險保留聖像。當時，一般農民皆把木刻鍍金聖像藏在普通的繪畫之後。她經常帶著年幼的米哈衣爾上教堂。他的母親也是

信徒。據斯塔夫羅泊爾的大主教安東尼說，當時俄羅斯的母親們都把基督教的基本價值觀灌輸給她們的孩子們。毫無疑問，戈巴契夫也曾吸收了把所有基督徒相互聯繫起來的一個觀念：「上帝創造了世界，在每一個人身上，我們必然見到神的形象，我們必須相互以愛對待。」

像所有農村子弟一樣，戈巴契夫很早就必須從事農業工作。從十三歲開始，他定期到集體農莊工作；從十五歲開始，他擔任「康拜茵」（聯合耕作機）的助理駕駛。在當地的拖拉機站，他一共工作了五年，這使他的學業與勞動相互結合。後來，他自己說，農家的氣氛和一切生活方式，以及早年與年長者共同工作的經驗，必然影響了他的性格及個人生活態度的形成。

由於德軍的占領，戈巴契夫的學業一度被耽擱，但一九五〇年六月終於中學畢業，考進莫斯科大學法學系。

## 二、大學生涯

莫斯科大學成立於一七五五年，是蘇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中心。一九四六年時，史達林決定對蘇聯科學大量投資；於是，在莫斯科西南郊區的列寧山建起莫斯科大學的新校園，所有的自然科學都搬進新校園；人文學科則留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舊校址，靠近克里姆林宮。在蘇聯，進入莫斯科大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通常的情況下，考生的錄取率是百分之十。

莫斯科大學不僅是著名的學府，更是共黨培養幹部的搖籃。當時，這所大學所吸收的學生主要有兩類，一是應屆的高中學生，一是退伍的軍人。可能兩個因素使戈巴契夫順利進入莫斯科大學。第一，戈巴契夫曾獲得過「勞動紅旗獎章」；第二，蘇聯高等教育部當時曾下令，限制猶太及社會背景「不可靠的」學生進入莫斯科大學，同時擴大錄取莫斯科以外各省學生的比率。

戈巴契夫為何選擇法學系，至今對很多寫戈巴契夫傳記的作者仍舊是一個謎。一九五〇年之前，戈巴契夫對法律專業從未表現任何興趣。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蘇聯青年大多希望成爲自然科學家或工程師；律師在當時是一項不受尊敬的職業。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農業專業知識比他的法律知識對他的政治生涯更有用。

事實上，戈巴契夫並不是喜歡法學本身，他感興趣的是政治，而法學裡面也有政治學課程。在莫斯科大學的學生中，胸前掛著勞動紅旗獎章的人實在不多，戈巴契夫是這些少數人之一。他有一分光榮感，他充滿愛國熱忱；他經常侃侃談論對黨和國家的責任。

進入莫斯科大學固然不易，順利完成學業也相當難。因此，他們必須勤奮學習，否則很難升級。戈巴契夫天資聰明，功課難不倒他；所以，他可以從容地參加大學的共青團的活動。他善於組織，有政治志向。最後，他當上了法律系共青團的書記，成爲與衆不同的特殊學生。

一九五二年戈巴契夫成爲正式的共產黨員，他當時二十一歲。加入共產黨是很重要的一步，這開拓了他以後在黨政機關中晉升的平坦大道。據戈巴契夫的捷克籍同學莫列納爾(N.

Mlynar)說，戈巴契夫當時相信，凡偏離黨路線的思想都是反黨。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強硬路線者。不過，在莫斯科大學生中，這並不是很突出的。

另一方面，他是一個擅於社交的青年，他與各式各樣的人物打交道。在他的朋友中，有猶太人、波斯人、韃靼爾人、捷克人、波蘭人、保加利亞人。在莫斯科大學期間，戈巴契夫很少與中國大陸學生打交道。五十年代初期，大陸學生是莫斯科最多的外國學生，但中共駐莫斯科使館，嚴格管制他們的行動，不准他們與俄國人共室居住。因此，在戈巴契夫的朋友中，沒有中國人。

### 三、賢淑妻子

戈巴契夫在校園內是相當活躍的。莫斯科大學像其他有名的大學一樣，每逢週末，都會舉行舞會。不同院系的學生，都可以在舞會中結識。就在這種場合內，戈巴契夫遇見了雷莎·瑪克絲莫芙娜(Raisa Maximovna)，她是哲學系的學生，對戈巴契夫頗有好感。他同這位溫柔的女同學談得很投契。

雷莎身材苗條，風度優美，路過之處往往使男生們目瞪口呆。這些學生們試盡各種伎倆想贏取她的芳心，但是她總是冷若冰霜。雷莎同戈巴契夫一樣，也是一個有獎章的大學生。當時，哲學系的學生並不學習狄卡爾和叔本華，祇是死記馬列主義。因此，戈巴契夫的朋友

們認為，哲學系的女生都是怪怪的，似乎都藏身在雲端裡。雷莎和另一名女子共居一室，是一個難以接近的目標。

雷莎確實是令人一見難忘的女子，身高五呎二吋，談吐優雅，舞步純熟。戈巴契夫在一次偶然機會中與她共舞，回到寢室時已相思纏身。在幾個星期中，他默然不語；最後，終獲佳人垂青。此時，戈巴契夫本身也相當英俊，頗有明星風度，生著一個范倫鐵諾的嘴，雙下巴，眯眯眼。但是，雷莎看中他的不是這些，而是她覺得，米哈衣爾很可靠。

對蘇聯人民而言，雷莎的背景仍舊是一個黑洞。由於她的雙頰較寬，人們相信她含有蒙古的血統，但是她的姓氏是烏克蘭的，而她的家庭曾多處遷移。年輕時，她的大部分時間在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魯比佐夫斯克城(Rubtsovsk)度過。謠傳她與蘇共權貴有親戚關係，由於這個原因戈巴契夫才順利青雲直上。這些謠言當然找不到證明。

有一點可以確定，她的父親在蘇聯國家鐵道部工作；有人說，他是一名工程師；也有人說，他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是，她的哥哥是一名文學作家，這是沒有疑問的。因此，她在就讀莫斯科大學之前，就對文學有充分知識和素養。這一點正可以補戈巴契夫的不足。他們兩個在莫斯科期間，經常雙雙進出書店、參觀博物館、外國博覽會、畫展等場所。因此，他比同學們對藝術、文學，甚至運動有豐富的體認。毫無疑問，雷莎在戈巴契夫的「文化發展」上扮演了一個突出角色。他們於一九五三年結婚。

雷莎與米哈衣爾的婚禮是刻板的，在婚姻登記所簽名了事。完成登記手續後，雙方的同



學和朋友們，爲他倆舉行了酒會和舞會。當大伙兒興高采烈之際，忽然有人想到一個問題：一對新人到那裡過夜？經過一番折騰之後，大家挪出一間宿舍，讓這對新婚夫婦單獨地過一夜，但在天亮之前，他倆必需起床，各自回到自己的寢室。到了他們結婚的第二年，他們才在列寧山的學生宿舍處獲得一個房間。

每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都有一個賢慧的妻子，戈巴契夫也不例外。他的少年時期在艱困中度過，熱切期盼家庭的溫暖。因此，他一碰上意中人，就把全部愛情投注在她的身上，呵護備至。

雷莎找到了一位如意郎君，比她想像的還要理想，兩人婚後生活相當美滿，感情融洽，互相關心，即使在公開場合也表現親密，伉儷情深。

他們生有一女兒，名叫伊蓮娜(Irina)，一九五六年出生，已出嫁。女兒與女婿都是學醫的。伊蓮娜現在是副博士(西方稱博士候補)，是一名醫學院的講座助理。女婿阿拉托列(Anatolii)是一位副教授、外科醫生，在莫斯科一家醫院已工作了十年；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血管外科學。戈氏夫婦現有兩位外孫女，可欣妮亞(Kseniya)及阿娜斯塔西婭(Anastasiya)。

由於雷莎的照顧，戈巴契夫的穿著一向整潔，與赫魯雪夫的不修邊幅成了強烈的對比。戈巴契夫的前額頂門之處，有塊紅色胎痣，正面拍照，不甚美觀。雷莎特別爲他準備一頂帽子，巧妙地蓋住胎痣，讓西方報紙讀者和電視觀眾的記憶中，留下他更完美和英俊的形象。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應該說明，我現在的職務，不僅對我本人而且

對我的家庭，都是一項嚴肅而責任重大的負擔，因此我很重視雷莎·瑪克絲莫芙娜所給予我的諒解、支持和幫助。」

#### 四、服務鄉梓

一九五五年六月，戈巴契夫大學畢業，本想留在莫斯科開創一番事業，但希望落空了。帶著年輕的妻子返回故鄉，雷莎當時祇有二十一歲。

回到故鄉的戈巴契夫已經不是一個拖拉機司機了。同時，他也不願利用其所學，服務於司法界。當時的司法完全為政治服務。他在斯塔夫羅泊爾市共青團委員會找到一分差事，意識形態部門的主管；作為一個莫斯科大學的畢業生，且擁有相當好的共青團工作經驗，這分職位實在很卑微。但是，這是一個起步。

一九五六年，該市共青團委員會第一書記莫拉浩夫斯克(V. Murakhovsky)調升，他推薦戈巴契夫為他的繼任者。他返鄉僅僅一年就升任了斯塔夫羅泊爾市共青團第一書記。雷莎初到這個城市時，在一所醫學院任教，後來斯塔夫羅泊爾農學院以高薪聘請她，在哲學系任教。由於她畢業於全國的頂尖大學，頗受該校同仁敬重。雷莎與人相處非常隨和；與戈巴契夫相敬如賓，也成為他的老師。

戈巴契夫在雷莎所授講的一個哲學課程上註冊，成為她的學生；一九六二年起，戈巴契

夫成爲這所農學院函授部學生。在課堂上，雷莎對自己的丈夫和其他學生一視同仁。有一次，在教室內當戈巴契夫侃侃談論康德時，雷莎馬上插嘴說：「你錯了，最好這樣去理解……」戈巴契夫曾告訴昔日女友蜜海洛娃(N. Mihailova)說，他經常向雷莎請教，他要演說時，雷莎是他的第一位聽衆。他稱雷莎爲「我的將軍」。

戈巴契夫在工作上可能表現得很好，因爲在一九五八年他被調升斯塔夫羅泊爾邊區共青團宣傳部部長，不久又升任第二書記。一九六〇年，升任第一書記，同時也成爲邊區共產黨執行局委員。此時，斯塔夫羅泊爾邊區共黨委員會的第一書記是庫拉科夫(F. Kulakov)，他原任俄羅斯共和國糧食生產部部長，任該邊區第一書記等於放逐在這裡，俟機重返莫斯科。從此，戈巴契夫的政治前途與庫拉科夫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身爲共青團邊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戈巴契夫當選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一九六一年）。這次黨大會是蘇共歷史的真正分水嶺，會上正式公開批史達林；一九五六年雖然已貶抑了史達林，但是那次祇是赫魯雪夫一個人發表祕密演說而已。從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聯開始了「專家治國」的路線，戈巴契夫可謂生逢其時。

一九六二年，斯塔夫羅泊爾邊區分組成十六個「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地區生產單位」。戈巴契夫成爲其中之一的黨組織的負責人，從此他脫離蘇聯共青團工作。不久這些組織被取消，戈巴契夫調升爲邊區委員會的組織部長，主管黨幹的升遷。這表示邊區第一書記庫拉科夫對他特別信任。

此時，戈巴契夫覺得，要出人頭地，單靠法學文憑是不夠的；於是他白天當幹部，晚上修習斯塔夫羅泊爾農學院的函授課程。這不僅使得他有了農業上的專業知識，成爲專家；而且使與他的上司庫拉科夫有進一層的關係。原來庫拉科夫是一名農業專業，畢業莫斯科農業大學函授部並取得學位；戈巴契夫則參加了斯塔夫羅泊爾農學院函授部，一九六七年考得農業學位；同一年雷莎也取得了莫斯科教育學院的副博士學位。

一九六五年庫拉科夫調回莫斯科，成爲蘇共中央農業部部長，戈巴契夫的職位暫未調動。次年，他被選爲斯塔夫羅泊爾市委會的第一書記。一九六八年，戈巴契夫調升斯塔夫羅泊爾邊區黨委員會，未經第三書記，直接升任第二書記，仍負責該邊區的農業。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一日，「真理報」第三頁，有一段簡短新聞報導說，蘇聯共產黨斯塔夫羅泊爾邊區委員會選舉戈巴契夫爲第一書記。現在，戈巴契夫未滿四十歲，已成爲蘇共超級精英分子之一。

## 五、晉身中央

斯塔夫羅泊爾邊區，在蘇聯南境，靠近黑海，但不在黑海之濱，面積八萬餘平方公里，人口兩百五十多萬人。在行政區組織中，邊區與省同一層級，兩者的區分不在於面積大小；而是在邊區內，有非俄羅斯民族，而這些民族人數太少不足以成立一個自治共和國，而在邊

區內成立民族自治區。斯塔夫羅波爾邊區含有「卡拉齊·索克遜自治區」。斯塔夫羅波爾邊區的首府就是斯塔夫羅波爾市，該邊區共轄二十六個區。

戈巴契夫受庫拉科夫的推薦，成爲該邊區的首號政治人物。他的父親從鄉下趕來爲他道賀，私下對他說：「米夏（「米哈衣爾」的小名），你不覺得，你現在身居如此高的職位上，是不是早了一點？」戈巴契夫回答說：「他們信任我，我將全力做好我的工作，因此我決不蒙騙他們。」

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八年，將近十年的任期中，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戈巴契夫都是一位極受歡迎的邊區黨領袖，理性、脾氣好、平易近人，善於鼓舞從屬積極工作。他步行上班，常被行人攔下，他不以爲忤，耐心傾聽。在他任內，教會容許活動。

一九七一年蘇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成爲中央委員。戈巴契夫的官運甚佳，他擔任邊區第一書記期間，風調雨順的年頭多，旱災的年頭也有，但旱災之年反而顯示他的預見能力和組織能力。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戈巴契夫任邊區黨委員會第二和第一書記期間，這個邊區的糧產有了明顯的上升，人民生活改善甚快，在同一時期內，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業卻遭到挫折。於是，全蘇聯把目光投向了斯塔夫羅波爾邊區，研究這個邊區農業改革經驗能否運用於全蘇聯。

值得一提的，一九六九年時，蘇聯又遭到了惡劣天氣，全國糧產不僅沒有按計畫增長百分之六·一，反而大降了百分之三；全國的形勢不好，反而更烘托出斯塔夫羅波爾的驕人

成就。這些情況，使蘇聯中央布里茲涅夫、蘇斯洛夫以及他的老長官庫拉科夫對他更加垂青。

蘇斯洛夫當時是蘇共中央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其地位僅次於布里茲涅夫，西方把他稱之為「國王的製造者」。他曾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四年在斯塔夫羅泊爾邊區黨委會擔任第一書記。可以肯定，蘇斯洛夫很早就賞識戈巴契夫了。庫拉科夫此時在中央負責農業，且儼然成爲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庫拉科夫突然因心臟病去世。他的死遺留下好幾個空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共中央農業部長、最高蘇維埃代表以及其他較不出名的職位。其中，農業部長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可以由政治局指派，不必等待由中央全會決定。不過，此事一直拖了幾個月，可見繼任人選有爭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蘇共中央人事大調動，名列新貴名單之末的，就是戈巴契夫，他的新職務是中央書記，很顯然，他繼承了庫拉科夫地位。關於庫拉科夫的繼承人選，確實經過了一番折衝。戈巴契夫不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意中人，但蘇斯洛夫顯然看中了戈巴契夫；同時，當時的「國安會」（KGB）主席與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皆賞識戈巴契夫，在得道多助的情況下，戈巴契夫才被提拔到蘇共的權力中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戈巴契夫到莫斯科上任；他的妻子雷莎在莫斯科大學也取得了一個副教授職位；此時，他們的女兒伊蓮娜已在莫斯科就讀。一年之後，戈巴契夫成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十月，升任正式委員。

在蘇聯，農業往往是政治領袖的墳場。戈巴契夫上台之時，正當蘇聯農業一度振興而轉趨式微的關鍵時刻，他所擔任的工作充滿困難與危機。一九七九年底，蘇聯揮兵侵入阿富汗，美國對蘇聯實施經濟制裁。當時美蘇之間訂有穀物合同，蘇聯從美國每年至少進口四千萬噸穀物。但是，美國的一紙法令，使該合同成爲廢紙。

這個階段內，主管農業的戈巴契夫負責兩個重要的工作。第一，向全國人民解釋糧食緊張是由於美國禁運所造成的，要求人民共渡時艱。第二，向其他國家採購糧食。因此，他有更多機會在電視、在報紙上露面，大做宣傳以抵銷美國禁運的影響。在這方面，他表現甚佳，使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地位更加穩固。政治人物經常見報，是政治地位上升的標誌。

此時，布里茲涅夫也覺得蘇聯內部有不穩定因素，決定要改善人民食品供應。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先做到農業改革。農業改革必須先改善農民生活、改善農村交通、住宅與文化設施。

形勢變了。作爲改革派的年輕一代的代表人物，戈巴契夫的發言權大大增加了。一九八一年一月，他以雄辯的口才，爭取到政治局老人們的支持，推行他所提出的農業改革。其實這套計畫，他早就在斯塔夫羅泊爾的集體農莊取得成果。這個計畫的要點是，取消了對自留地使用的種種限制，土地仍屬於國有，但農民可自由地在自留地上作自己想要生產的東西。改革有了成效，農民生活得相當程度的改善，戈巴契夫也因此在一九八三年時獲得列寧勳章。

一九八二年一月，負責理論工作的蘇斯洛夫去世，安德洛波夫與契爾年科爭奪此一第二

號寶座，戈巴契夫支持安德洛波夫。結果，安德洛波夫獲勝。當年十一月十日，布里茲涅夫去世時，安德洛波夫順利地接掌蘇共總書記職位，成爲蘇聯政治體系的第一號人物。安德洛波夫當政時健康不佳，但仍力圖革新，但天不假壽。

在安德洛波夫的統治下，戈巴契夫負責監導全國經濟，以及較低層黨幹的任命；此外，從一九八四年初到一九八五年七月，他擔任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因此，當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安德洛波夫因病身亡後，契爾年科登上第一號寶座時，戈巴契夫順理成章地成爲黨內第二號人物。契爾年科也體衰多病，任總書記不久，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去世。

契爾年科病故消息公布後，在短短的五個小時內，戈巴契夫順利地當上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成爲蘇聯政治體系中掌大權的第一號人物。

## 六、領導特質

戈巴契夫任蘇共總書記時，正好五十四歲，是史達林以後最年輕的總書記，也是當時政治局中最年輕的成員。此時，政治局的平均年齡爲六十七歲。其後，雖經三度改組，他仍是政治局中最年輕者。他不但年輕，而且有才幹，充滿活力和改革的企圖心。

戈巴契夫崇拜列寧，他們兩個都是學習法學出身。實際上，戈巴契夫從大學生時代起，



就把列寧視爲其模仿的典型。他一生從事黨務工作，本是克里姆林宮塑造出來的典型黨幹，祇是他具有列寧所特有的靈活作風與務實能力。

戈巴契夫精通西方政情，了解民主的妙用。從七十年代當上蘇共中央委員後，他有機會出使外國，並開始閱讀西方政治書籍，探悉西方政情。事實上，作爲一個法學系的學生，他會有機會接觸西方著名政治學者的政治思想。基於這個背景，戈巴契夫上台後一再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化」，他了解，沒有政治民主，經濟改革將徒勞無功。

他擅長表達，能說善辯。作爲法學系的學生，戈巴契夫曾受過口才訓練，加上他個人天賦的才能及雷莎從旁指點，使他成爲列寧以來最擅長演說的蘇聯領袖。講俄語，必須加上手勢、眉毛、頭及雙肩的動作，才能充分表達。對於這些動作，戈巴契夫皆能運用自如。因此，他的演說頗能吸引聽衆。在接見外賓時，他無須助理從旁協助（他的幾位前任皆不能做到這一點），也能交談無礙。同時，戈巴契夫可以不備講稿而演說。他的簡單樸實的方法與語言很能贏得聽衆的共鳴。

他帶有民粹主義作風，強調集體領導。戈巴契夫上台後，表現親民作風，四出訪問，在街道上、工廠內與民衆握手交談，親切自然。一般民衆可以直呼他爲賽爾蓋維契（他的中間名），他欣然接受。這些親民作風，頗能取得一般民衆的歡心。這與以往蘇共領袖的祕密和高在上的作風截然不同。他不是一個神，他是人民的領袖。此外，由於戈巴契夫的作風不同，也由於「總書記權力遞減律」的作用，戈巴契夫在政治局內一再強調集體領導原則，以說服

方式追求政治局內的共識。

他重視報刊，經常會見記者。他在地方當黨幹時，就與其他共黨幹部不同，對報刊就很有感興趣，常常與記者們交談。戈巴契夫曾強調，記者不僅要報導正確，而且要寫得生動。他當了總書記後，不但經常接見國內記者，也時常會晤外國記者。這一作風不僅有助於傳播他的政治理念與改革觀點，也幫助他改善了國際形象。

在提名戈巴契夫任總書記時，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和外交部長葛羅米科曾說：「同志們，這個人面帶可愛的微笑，但有一口鋼牙。」接著他說，戈巴契夫具有各級組織，包括在地方黨委員工作和在中央書記處從事黨務工作的經驗，能夠熟練地主持政治局和書記處內的工作。葛羅米科稱他智力敏捷，對國際問題瞭如指掌，具有堅強的信念和堅定的方向。他在政治上非常敏感，但從來不以「非白即黑」的觀念看待一切事務，他具有分析頭腦，遇到問題時能夠冷靜剖析，並推出結論；他學識淵博，具有組織能力；他能夠與別人和睦相處，輕易地找到共同語言。

戈巴契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不到兩年半，以明快的手法，順利地摧毀了保守勢力，有效地掌握了政治局與書記處，使自己的權力鞏固。同時，也壓制了軍方的勢力。布里茲涅夫的晚年，軍方勢力有上升之勢，若干高級將帥桀驁不馴，成爲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戈巴契夫上台後，借機整頓高層將帥，重新強調政治領導對武裝力量的統攝權，使軍方順從黨政的改革方案。

## 七、獲諾貝爾和平獎

戈巴契夫成爲蘇聯的政治領袖後，西方朝野對他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是正面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表示，戈巴契夫是一個可以共事的人。一開始，西歐大多數人相信，戈巴契夫的改革措施是真誠的，同時對他的「和平與裁軍政策」持肯定的看法。

美國人民認爲他是一個克里姆林式的「偉大的溝通者」。這個雅號原是美國一些人士加諸雷根的。美國商業鉅子漢彌爾(A. Hammer)說，戈巴契夫的弱點在於過分自傲與自信，且有時會發脾氣，不過在公開場合，他尙能自制，不輕易動怒。

美國「時代週刊」曾評論說，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固執但具有彈性，忠於意識形態但又是一個激進的試驗者。他是數十年來，美國及其盟國所面對的一個最危險的對手，也是最有建設性的一個對手。

不過，美國若干保守勢力則認爲，戈巴契夫是蘇聯共產黨舊模子鑄出來的新人。在內政上，他不是一個改革者，祇是繼承安德洛波夫的政策。在對外政策上，他的作風改變了，但對外政策實質未變。他是一個完美的演員，可以扮演別人所希望的任何角色。但是，隨著蘇聯內外政策的不斷變化，這類對戈氏不信任的聲音已經變得微弱。

他執政不久，「戈巴契夫」這個名字在東歐已變得家喻戶曉，甚至有一首關於他的新歌一

度在東歐流傳。這首歌中有下列幾句是：

「春天從東方來，

……

米哈衣爾，

希望你把新的改革，

進行到底……你將建造一個新的世界。」

果然，他以「新政治思維」為基礎對外政策，已使世界發生巨變。美蘇關係已經和解，他們共同聲明不視對方為軍事敵人；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解體了。象徵冷戰的柏林圍牆倒塌了，東西德統一了。冷戰的陰影逐漸遠去。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把一九九〇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蘇聯總統戈巴契夫。

這個委員會在一項聲明中說，把一九九〇年的和平獎給予戈巴契夫，是因為他在當前的和平過程中扮演了主導的角色。委員會說，近年來在西方與東方關係中，發生了重大變化，談判取代了對抗，歐洲的一些古老國家重獲自由，軍備競賽的速度放慢脚步，在武器管制與裁軍方面看到了積極的進展，很多的區域衝突已獲解決，或接近解決；聯合國開始扮演其所設定的角色。

這些歷史性的轉變，固然出自很多因素，但是戈巴契夫個人在這個和平過程的多方面貢

獻是舉世公認的；至少已受到諾貝爾委員會的肯定。

在此之前，戈巴契夫曾被數度提名，但未中選。這次他從一百多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得來不易。

諾貝爾和平獎從一九〇一年開始授予，至今將近一半時間，這個世界處於冷戰狀態中。美國與蘇聯是這場冷戰的主角。因此，這兩個超級強權的領袖從未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這次戈巴契夫獲獎雖是例外，但並非意外。一九七五年，蘇聯氫彈之父和民運領袖沙哈諾夫(A. Sakharov)首次贏得諾貝爾和平獎；五年之後，他因反對蘇聯軍事干涉阿富汗而被放逐至高爾基市，行動自由受限制。戈巴契夫上台之後，才使這名民運領袖重獲自由。

戈巴契夫獲悉得獎消息後對訪問他的記者說：「任何人在這種時刻都會無法言語，我很激動。」他並且說，主要問題不在於他個人，而在於它反映了蘇聯改革事業的重要性。

當各國領袖紛紛向戈巴契夫道賀之際，蘇聯的百姓對此項殊榮卻淡然處之。因此，「紐約時報」寫道：「現在，他是在自己國內不享榮耀的先知，但他將是這個時代的歷史人物。」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蘇聯的制度是多麼無效率。也許，他不知道如何去改變它，但他知道，改革必須極端，必須數十年才會完成。他也知道，增進國際和平是國內完成改革的先決條件。